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

——威宁·石门坎·苗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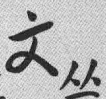
Quyu Wenhua Yu Shehui Bianqian
——Weining Shimenkan Miaozu

马玉华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批准号09BZS032)的

“次苗族百年社会文化变迁”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文丛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

——威宁·石门坎·苗族

Quyu Wenhua Yu Shehui Bianqian
——Weining Shimenkan Miao zu

马玉华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威宁·石门坎·苗族/马玉华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5650-2496-2

I. ①区… II. ①马…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IV. ①K29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743 号

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

——威宁·石门坎·苗族

马玉华 著

责任编辑 张 慧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496-2

定价: 5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原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起，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为了既体现丛书的连续性，又显示新一家出版社的气象，丛书名改为“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和编辑牛洁颖女士的直接主持下，共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和我的5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参与这套丛书的朋友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也特别珍惜和他们相处过程中所获得的真诚。记得我在给牛洁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我很欢迎和你推心置腹地讨论问题，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书出好；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以诚相见；我想效果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互相更加信任，友谊愈笃。”这段文字代表了我们的共识。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次年我开始招收学生。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然而，我仍然感谢学校领导、研究生院和所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校内校外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份可能，如同我在第一届学生答辩的时候所说：“使我有机会获得培养青年、提携才俊的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它来源于教育的诚实、神奇和自我满足。

把我指导的学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博士论文丛书，是我招收博士生伊始就定下来的努力方向，也是一开始就向同学们提出来的目标。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这套丛书已经拥有29种著作，预计今后几年内将达到50种左右的规模。假如有人问我，丛书的价值何在？我依然回答：任何著作一经出版，对它的评判权从来就不属于作者。只有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命运。

除了我的书以外，这套丛书的著作，多是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读他们的书，能读到一些锐气，自然也会有一些幼稚。同学们努力学习的风范是值得夸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丛书为了解当前博士生教育提供了一例个案，不论这一个

案有没有价值。

回顾招收博士生以来的教书生活，我从内心深处感激我的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年龄大小、从事过什么工作，他们为了读书求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坦诚相处，教学相长，虽然也会有艰难或者隔阂，但毕竟能够获得一些理解与成长的经验。我始终认为，生活的本质在于真实。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曾对同学说过，追求真实而不追求虚伪，追求幸福而不追求痛苦，追求理解而不追求怨恨。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是一种知识、道德和能力的全面提高过程，它既是学生的提高过程，也是老师的提高过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积累起来的进步。

在同学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以同样的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在这里，我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不过，我们拥有传统人文的深厚资源、外来学术的精彩信息和百年老校的丰富积淀。它们浩如大海，蔚为壮观。也许，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师道与学统的交汇，个人与时代的融合，才是他们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学习的主要成果，也是当代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引导同学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知识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的完整过程。对老师来说，同学的敏锐、勤奋与活力，是那么的宝贵；对于同学来说，每一类学术题材的发现，每一种学术思路的开拓，每一个细节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学问启蒙和心灵震撼的作用，甚至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新认识。20多年来，有相当多的博士论文开辟了各自学术领域的新境界。它告诉我们，博士论文质量的根本标志，是按照学术规范研究解决问题所达到的水平，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及其所包含的开拓性成就。有鉴于此，我们才应该把博士论文看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当下社会和时代应当能够留下来的精神产品。要求所有博士论文都达到这样的水平也许很难，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必要的，鼓励每一位博士生向这样的目标努力前进也是有意义的。

是为序。

李良玉

2011年8月30日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生命的七彩

——《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威宁·石门坎·苗族》序

《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威宁·石门坎·苗族》，是马玉华博士的新书，也是继《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之后她的又一本边疆民族史领域的著作。现在书稿已经三校，马上就要面世了。借着写序的机会，我向她表示热烈的祝贺！

马玉华，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教授。1982年入云南大学历史系读书，1986年入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2001年被评为副教授。2002年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入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出站，次年调入云南大学。又一年，升为教授。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一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它研究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地区进行的少数民族调查，分析了这些活动的社会背景、不同类型和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价值。作者的博士导师、云南大学教授万永林先生指出，“此书开拓了研究民国时期各级政府调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一个新局面”，将对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进而将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的作用”。

以着手博士论文为起点，马玉华博士就开始了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艰难旅程。对于自己的博士论文，她有过以下的回忆：

为了做好论文，平时尽可能抽时间在云南省档案馆看资料、抄档案；假期先后到四川、贵州等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那几年，虽然经常在云大校园内，可是时间总是不够用，行色总是太匆匆，心情总是很紧张，云大的春花秋色几乎没有关注过。

当年，她联系我，希望进入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我同意接受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她在收集利用历史档案方面已经训练有素，并且掌握了大量西南少数民族史的档案资料。换一个角度，不再从边政学角度，而从民族学角度重新解读这些档案，加上继续拓展史料的收集和利用，她将会有新的收获，达到新的境界。



这本《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威宁·石门坎·苗族》，是在博士后研究的基础上申请并获得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成果。我还记得，入站之后她迫切希望尽快确定研究课题。最初的谈话是在医院的病房里进行的——她到医院探望生病的我的时候，时间是2006年9月23日。到2016年1月10日收到她寄来的书稿一校清样，前后将近10年。

这恰恰应了那句老话：十年磨一剑。

在本书的后记中，她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付出：

从对课题的一无所知，到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书稿，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为收集档案资料，我先后到贵州省档案馆（两次）、毕节地区档案馆、威宁县档案馆查找资料；两次到石门坎田野调查，收集乡政府档案，进行访谈，并做调查问卷；在石门坎苗族知识分子陶绍虎、杨体耀、朱爱光、杨世武等老师的帮助下，到贵阳采访张超伦和张坦老师，并随他们到安顺采访了王文宪、娄发文等老师。更多的时候则是埋头整理资料，解读档案，分析研究，思考写作，进行修改。论文的大纲曾多次改动，本文的写作和修改数易其稿，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反反复复地修改和核对原文……

我是这本书的第一读者。第一份完整的书稿是2013年4月23日发给我的，第一份完整的修改稿是2013年7月24日发给我的，但是她的后记直到2015年6月4日才写出来。读到后记距离读到初稿，已有2年多时间。但是，我仍然掩不住最初闻到墨香的兴奋，仍然掩不住为作者长途跋涉之后透过文字溢发出来的疲惫、惊喜和坚韧意志而感慨。

这本书有哪些特色呢？

第一，建立了分析研究对象的多维视角。

本书研究的课题，是以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乡近代基督教传教事业为中心的县域社会变迁。由于石门坎是一个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就开始布道的闻名于西方的基督教典型，因此，对石门坎的研究早已是一个学术热点。本书把视野从石门坎放大到以石门坎宗教事业为中心的整个威宁县，从单纯的宗教传播研究扩大到宗教传播影响下的民族区域社会研究，是一种具有很大的开拓性的尝试。

当代的威宁县是一个民族自治县。这样的边远地区，民国时期是包括在所谓“边疆”问题的大范畴里面的。过去有一个“边政学”的概念，也有人提出过“边疆学”的概念。不论怎么说，国家领土边界问题，边疆安全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区域社会发展问题，应该是五个最重要的问题。一般说来，前两个问题多半在地方当局配合下由中央当局处置，而后三个问题则是地方当局社会治理的经常性课题，也是影响地方发展的三个要素。现在，威宁县不属于边疆地区，但是，它所存在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具有一致性。从这三



者相统一的角度上叙述百年来的威宁，自然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新的体验。

第二，采取了长时段的解释方法。

本书对威宁的记载，贯穿了整个20世纪。时间是最好的历史坐标，它把晚清社会、民国社会 and 新中国社会石门坎和威宁人民的际遇，非常清晰地描绘出来了。前面说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区域社会发展问题，是影响边疆和边远民族地区社会水平的三个核心要素。在这里，所谓区域社会发展，可以做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是指地方当局在正确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同时，发展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施政方略；另一方面，是指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宗教、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下和谐进步的状态。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单靠宗教是不能实现的。最根本的条件当然离不开国家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是通过政府公权力的运用显示出来的。

就威宁地区来说，这种长时段的叙事方法的优点是，形成了晚清时期、国民党时期、新中国时期国家作用及其绩效的鲜明对比，从而能够为当代民族宗教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本书作者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时期由于以柏格理为代表的一批中外传教士的献身传教，基督教文化扎根石门坎，并且以教育、卫生和乡村文明方面的不俗成就流芳于世。但是，在这样一个偏僻和贫穷的小乡村，国家在推进地方现代性进步方面从来就是缺位的。不光对于北京来说，这里是天高皇帝远；就是威宁州的官员，恐怕也从来不想知道这里的老百姓自古以来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因此之故，历史上就没有文字、没有稳定的政治共同体、没有统一的精神传统的当地苗族群众，一旦接受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无私救援之后，不仅很快接受了文明的洗礼，而且走进了只知牧师、只知基督教而不知国家的政治盲区。发现问题的是国民党政府。它的解决措施是培养当地上层民族宗教人士、经济支援、加强国家管理等一系列“汉化”政策。这个政策的推行是渗透性改良性的，事实证明也是相对稳妥的。新中国某个时代，当然也不乏民族宗教政策成功施行的时候和案例，但是从总体上看，是极“左”路线政策造成的问题远远大于成就。最突出的是三点：用阶级斗争的敌对性思维看待宗教事业，并且错误地处理宗教问题；错误打击了当地民族宗教人士，特别是上层人士；强制性推行计划经济模式，使公有制生产生活方式长期阻滞社会进步。由这里可以看出，极“左”路线政策不仅不利于民族宗教地区国家本位的建立，而且起了灭活社会精英、扰乱经济规律、弱化国家基因的作用。这种原因所造成的当地的贫穷落后，是一种国家干预式的贫穷。

所谓长时段的解释方法，好就好在它能把一个延续性时代中不同阶段的事物的特性，通过叙述事实本身造成的鲜明差异，凸显它们的不同品质，从而达到正

确解释历史的效果。

第三，历史档案的广泛收集利用。

必须指出，马玉华博士的解释体系，并非生搬硬套地使用某种理论模式、预设立场的结果，而是通过深入基层生活、深入档案馆和图书馆、深入研读史料，包括和我的深入讨论，从而在发现事实及其本质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叙述。记得2009年8月，我在昆明的时候曾经花时间读过她收集来的材料，并为她所下的功夫所震撼。在那之后，她又继续挖掘，继续找人座谈，数次去威宁和石门坎。我想，本书的材料特色将是它的学术穿透力的可靠保证。

马玉华博士在博士后流动站的时间只有2年，其中，实际待在南京大学的时间，只有一年。2006年以来，不知不觉已经10年了。经过自己的努力，她已经完全成熟起来了。

首先，她的学问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6年2月10日，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从上大学本科开始到读博士，一直都在云南，视角受限，思路不够活跃，很不利于研究。我渴望到南京大学，希望听从您的课题安排，在您的指导下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恳请李老师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今天读这封信，我仍然为她的强烈的求知欲望所感动。如今，她的博士论文，她主编的“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中的五卷本“西南边疆卷”，加上她的这本书和大量论文，她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当代边疆民族史优秀学者的行列。这是她用奋斗精神为自己书写的人生篇章。

其次，她用无与伦比的毅力，克服了自己的身心弱点，使自己努力达到从容生活的境界。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比上述成就还要困难、还要辉煌的成就。我深深地为她祝福。

入站不久，我就隐约地感觉到她有某种心理负担。这么多年来，她承受的家庭的压力空前巨大。2008年开始，她的父亲先后3次中风，半身不遂，最后在2014年春节离开人世。她是家中独女，病人以及家中的一切事情，都要经手处理。我想，即使有她的先生小郭的全力支持，对于一个女性来说，这该是多么不堪重负的问题！更严重的压力来自于抑郁症的困扰。现在，她在本书后记中坦然承认：“我的抑郁症一度严重到活不下去，曾多次徘徊在死亡的边缘。”这说明她已经能够勇敢地面对，成功地从这种困扰中走出来了。我为她欢欣鼓舞。

在和她的交流中，我非常注意鼓励她减轻心理压力，坚定地面对生活。

2006年12月3日，我在信中对她说：

佛家人常说，境由心造，是指相同的环境里，人的主观认知不同，对环境的

感受不同。美学上也常说，美是主观的，可见主体价值对客体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有他所面对的人、事物、社会和自然，自身内心世界的坚强、执着，是他乐观生活的根本依据。

2006年12月19日，我在信中对她说：

在实际生活中，在无数的琐事、烦恼、矛盾中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平衡，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它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2007年2月27日，她来信询问有没有注意到关于《红楼梦》演员陈晓旭出家的新闻，我在给她的回信中说：

以平和之心态对待人生，以积极之精神对待事业，以丰富之情感对待他人，以平静之眼光对待社会。不得不失，不喜不忧，不卑不亢。如月光之淡，流水之长，江海之深，冰雪之洁，不亦乐乎？要者，我心即佛，不他求也。

2011年1月16日，她的研究提纲已经确定下来，我在给她的信中说：

你现在家里有病人，需要协调，自己身体也不好，做课题是一个方面，确保健康、快乐、和谐是更重要的方面。望你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安心生活，安心做事，好吗？

更多的交流是在电话中。无论发生多么复杂的事情，无论工作上发生多么强大的压力，我总是努力地为她设想解决的方法，反复地叮嘱她必须硬着头皮坚持住。我相信，这种交流是帮助她战胜精神困扰的有利条件之一。

我历来主张，读书应当有益于生活。所谓有益于生活，是指通过读书，掌握机会，改善自己的境遇，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是指获得知识，启发智慧，正确处理群己关系，提高做事能力，促进身心健康。如果说马玉华博士和我的相处在这两点上都有所获益，我想，这不仅是她，而且也是我的重大人生成就之一。

马玉华博士是一个善良而又淳朴的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诚恳而又贴心的学生。她和我相处的往事，常常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再现出来。2011年11月，我去昆明开会。会议结束之后，她和小郭——她的踏实、沉稳、忠实的伴侣一起陪我去了度假地螳螂川。正是由于这次旅行，我写下了那首《七彩的云南》，后来发表在《南京大学报》上，也收录在《李良玉史学文萃》之中。不知道七色的彩虹是不是人间最自然最美丽的颜色，但是我相信，有它的烘托，马玉华博士的生命色调一定会更加绚烂起来。

是为序。

李良玉

2016年3月22日18时21分完稿

内 容 提 要

本书对一个乡村社会的研究，是运用整体性和长时段方法的一种尝试。

石门坎位于贵州省威宁县西北部，与云南昭通、彝良接壤，处于滇黔交通要道，是一个民族杂居地，居民分属汉、苗、彝、回、布依等民族，是我国大花苗聚居区的中心地点。晚清时期，当地是威宁县彝族土目安荣之管辖的一个小山村，民国时期属于威宁县第七区行政建制，1953 年才成为威宁县石门乡。20 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之后，石门坎逐步成了闻名世界的地方。

本书在 20 世纪的国家背景中，从苗族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国民政府对威宁苗族地区的汉化管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后石门坎的变化等方面，梳理了百年历史脉络，记录了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滇东北、黔西北苗族地区的重大事件，分析了这一地区苗族社会的政治结构、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

清末，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建教堂、办学校、办医院，创制苗文，从事慈善事业，引发滇川黔边苗族群众大规模皈依基督教，使石门坎成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族教会的中心。经过循道公会多年经营，教会学校从一所小学发展到几十所，并辐射到滇川黔边方圆几百里地区，把一个偏僻贫穷落后的地方发展为滇川黔边苗族文化中心，影响遍及云南、贵州、四川的几十个县，并且带动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信仰基督教。当时，国内基督教界称石门坎是“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国外基督教人士视其为“海外天国”“香港第二”。长期以来，柏格理成了国内外民族史、宗教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石门坎也成了上述各学科的重要区域和研究典型。

基督教的传播，使信教的苗族群众改变了传统宗教信仰，提高了苗族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教会对文化教育的推广，培养了大批苗族人才，提高了苗族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带来了威宁石门坎苗族社会的变化。

石门坎文化教育的成就，引起了国民党各级政府的重视。国民政府推行民族

同化和利用基督教的政策进行管理，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基层党部、开发苗族地区经济、发展汉文化教育等措施，加强了对石门坎地区的开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土地改革，苗族同胞获得了土地。政府的经济扶持政策，一定程度改善了群众生活。一些特定的民族优待政策，发展了威宁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促进了苗族社会的进步。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给威宁社会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使威宁石门坎苗族社会再次发生巨大的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治理绩效的不同，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督教文化的嵌入、汉文化的塑造、跨文化的交流是引起苗族社会变迁的外部动力；苗族群众的生活需要，他们的主体意识的慢慢觉醒及其观念的进步是其社会变迁的内源性动力；而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是推动苗族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

Abstract

This book has tried to do a research on the rural society with an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view.

Shimenkan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Weini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at the strategic transport point bordering Zhaotong and Yiliang of Yunnan Province. Shimenkan is a multi-ethnic area in which the Hans, the Miaos, the Yis, the Huis, the Buyi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live, especially Dahua Miaos live here in compact communit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was a small mountain village controlled by An Rongzhi, the head (so called Tumu) of the Yi nationality , 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the 7th district of Weining County, in the year 1953, it became a township in Weining County. At last, Shimenkan had become somewhat world-know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in 20th century early .

Considering the cases of China in 20th century, this book covered the traditional system and culture of the Miao people, the popularity of Christianity in early modern times,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by the GMD government, the socialist reform in the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hang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recent years. By going through the history of a whole century, this book had recorded th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happened in Northeast Yunnan and Northwest Guizhou which is located around Shimenkan, and it anylized the social structures, religions, ideologies, customs and ethnic psychology in these areas.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Samuel Pollard, a priest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began to build churches, schools and hospitals, and helped the Miao people to create their own writing as well as some charities. As a result, quite a few Miaos in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became Christians,

and Shimenkan became a center of the Miaos believing in the Methodist Church. At first, there was only one primary school in Shimenkan, and then scores of schools were built in Shimenkan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Shimenkan developed from a backward and poor village into a cultural center of the Miaos in southwest China with much influence in scores of counties in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Thus, the Miaos led other minority groups to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In those days, Christians in China called Shimenkan the cultural center of the Miaos in southwest China while the Christians abroad called it overseas paradise and another Hong Kong. For a long time, Samuel Pollard had become a popular figure in the ethnolog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and Shimenkan had also become a typical case in these studies.

The popularity of Christianity helped some Miaos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from their traditional religious beliefs, enhanced their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by the Methodist Church helped train lots of Miaos to promote their literacy and civilisation degree and led to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is area.

Being attracted by the accomplishment on cultural education achieved by Shimenkan, the GM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adopted the policies of ethnic acculturation through Christians and established some grass-roots Bao-Jia institutions and GM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which helped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here. Thus the the GMD government had not only developed the economy but also strengthened it's control over the Miao area in Shimenkan, Weining.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PC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ethnic regional autonomy and established Weining Yi-Hui-Miao Autonomous County. The Land-reform in Weining resulted in the acquisition of cultivated land by the local Miaos and the favorable economic policies improve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Some favorable policies for ethnics developed the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health care undertakings in Shimenkan and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ao society.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the People's Commune Movement, the Education on soci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branded on the society of Wei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ince 1978 led to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in Shimenkan.



In different periods, different governments (the Rep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d adopted different religious and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these policies had impacted on the rural society of the minority communities strongly.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nd Han culture, along with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end to be the external motivations for the changes of the Miao society; the self-needs of the Miao, the self-consciousness, the changes in concept tend to b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s for the changes of the Miao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the reforms of social system, and the influence from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all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changes of the Miao society.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1)
二、研究综述	(4)
三、主要内容和思路	(9)
四、研究方法	(10)
五、重点和难点	(11)
六、涉及的概念	(11)
第一章 威宁石门坎的地理、经济和民族	(13)
第一节 威宁的地理、经济和民族	(13)
一、地理和经济	(13)
二、历史沿革和民族	(14)
三、苗族的历史及近代的地理分布	(17)
第二节 石门坎的地理、经济和民族	(23)
一、地理和经济	(23)
二、历史沿革和民族	(26)
三、滇川黔地区的苗族	(28)
第二章 循道公会在昭通	(40)
第一节 昭通立足	(40)
一、循道公会及其组织	(40)
二、昭通概况	(44)
三、传教士在昭通的布教	(45)
第二节 循道公会西南教区	(51)
一、昭通教会的发展	(51)
二、昭通在滇川黔边基督教传播中的地位	(60)

第三章 石门坎：基督教的示范性	(67)
第一节 石门坎教会的建立	(67)
一、传教士初到石门	(67)
二、石门坎教会的开基	(69)
三、石门坎教会的发展	(73)
第二节 苗族教会的发展	(76)
一、石川联区的苗族教会	(76)
二、教会的本土化	(79)
三、基督教在苗族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	(90)
第三节 基督教对威宁苗族社会的影响	(101)
一、宗教信仰的改变	(101)
二、文化教育的提高	(104)
三、政治意识的觉醒	(105)
四、生活习俗的改革	(109)
五、民族意识和心理的变化	(112)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威宁苗族地区的治理	(115)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	(115)
一、民族政策	(115)
二、宗教政策	(118)
第二节 石门坎特殊文化区	(121)
一、石门坎引起各级政府的关注	(121)
二、国民政府对威宁苗族的政策	(126)
三、威宁石门坎苗族教会的衰落	(134)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威宁地区的苗族社会	(136)
第一节 威宁的解放	(136)
一、中共对威宁的接管	(136)
二、苗族对黔西北解放所做的贡献	(138)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	(140)
一、民族政策	(140)
二、宗教政策	(143)
三、国家对基督教的政策	(145)
四、西南局和贵州省的民族宗教政策	(150)

